



柏林墙是在分裂的大陆上的一个分裂的国家中的一个分裂的城市的象征，它标志着欧洲冷战时期分裂的地缘政治和思想意识。柏林墙的倒塌代表着注重个人自治与经济创业精神的西方模式的胜利，代表着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占了上风。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文章来自数位重要学者、一位在表达异议需要真正勇气的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一位亲眼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墙在东欧各地倒塌的新闻工作者。

## 本期目录:

前言.....	2
走向 1989 年的历程.....	5
未来尚待见分晓.....	9
“我将终生记得那一天” .....	15
“朋友，那些的确是难忘的日子” .....	18
柏林从分裂到统一：1961-1989 年大事记.....	22
1989 年的新闻尚未传到某些国家.....	28
必须捍卫 1989 年的历史业绩.....	29
西德和美国的不同反应.....	31
柏林墙倒塌带来新德国崛起.....	33
1989 年革命令人瞩目的一些原因.....	35
“我们去找袖珍计算机器！” .....	37
具有现实意义的远见卓识.....	38
柏林墙倒众人推.....	40

## 前言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

作者：迈克尔·杰伊·弗里德曼

柏林墙是分裂的象征——代表着一块分裂大陆上的一个分裂国家中的一座分裂城市，而这一切又源于数十年之久的历史分歧。征服纳粹德国的是以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英美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苏联为首的多国联合力量。这种使欧洲从轴心国的占领下获得解放的联合力量自然将这样一个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哪一种制度将占上风？在哪里占上风？

战胜国之间未能对此达成共识是真实历史分歧的反映。苏联自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先锋，用列宁的话说：“正在等待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军团跟上”。西方国家政府据此认为，它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听命于莫斯科；而苏联领导人非不是在“等待”，而且是在不断于暗中加速革命。英国人、美国人（还有波兰人、芬兰人、立陶宛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都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独裁者的交易——德国的希特勒和苏联的斯大林瓜分了波兰。直到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以及在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民主阵营国家才与共产主义大国联起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并没有达成一个明确的和平协议。实际情况是——以非常简单化的方式说——那些把一国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对该国战后的政治特征和地缘政治结盟起了决定作用。因此，西欧基本上成为与美国结盟的自由民主国家；东欧国家则由得到莫斯科认可的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它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均受制于苏联。

德国的情况不同一般，柏林尤其特殊。英、苏、美三国分别在德国不同地区击溃了纳粹军队，在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上，“三巨头”商定把德国划分成四个临时占领区，法国为第四个占领国。至于德国的首都和主要城市柏林，则位于苏占区内110英里处，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同盟国集团诸国商定了一个类似的四国分治柏林方案。

即使在那时人们已懂得，对德国人力和工业资源的控制将对战后的力量均衡具有重要影响。

在此前40年中，德国两次侵入苏联，因此苏联坚决要让战后的德国或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是至少也要让它永久性地成为一个中立、没有军队的弱国。西方盟国则很快认识到，除非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走上民主富足的道路，否则苏联就有可能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美国出资130亿余美元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帮助保障了西欧国家的繁荣兴旺。苏联和它控制下的东欧国家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与此同时，在苏联控制区，红军将德国的工厂和其他工业设备拆除运往苏联，作为德军在苏联造成的巨大破坏的赔偿。

后来，在1962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把西柏林比作“西方的睾丸”，他说：“每次我想让西方尖叫，只要挤压柏林就行。”他的前任们或许没有使用同样的说法，但他们也同样把西柏林这块处于正在成形的苏联集团包围中的毫无屏障的西方飞地看作是一个可以向西方施压之点。1948年6月，西方盟国与苏联在德国的经济重建问题上意见相左，红军封锁了西柏林。西方以英美为首展开“柏林空运”（Berlin Airlift）作为回应，每天用飞机为西柏林居民运送大约13000吨食品，直到1949年5月斯大林解除封锁为止。数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西德——在西方占领区宣告成立，同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东德——在苏联占领区成立。

在以后的12年中，柏林居民拥有“冷战”中的欧洲人少有的一种机会：投奔西方。在1949年9月至1961年8月间，大约有270万东德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跨过边界进入西柏林，然后再从那里乘飞机到达联邦德国。在一个涉及究竟哪种制度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和其他愿望的意识形态竞争中，这样的大规模移民（在此期间东德人口数确实减少）无疑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谴责。与此具有相同意义的事件还有：1953年对于东德工人反抗的镇压；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起义；1968年的捷克人民革命；以及1956年、1970年、1981年多次发生的波兰人民抗议。

1961年8月，东德开始建造柏林墙。刚开始只是带刺的铁丝网，但不久就扩展为5米高、165公里长的钢筋混凝土墙，墙顶布满铁蒺藜，并设有武装哨台和瞭望塔，墙下埋有地雷。当时的西柏林市长勃兰特（Willy Brandt）担心这堵墙会把西柏林变成一个“集中营”，他警告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西柏林人的士气可能被瓦解。肯尼迪很表同情，但他坚持认为，一堵墙要比一场战争好过千百倍。肯尼迪于1963年6月飞到柏林，在那里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他向当天到场的25万多柏林人（占该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坚定地说：“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柏林墙给欧洲带来了稳定，使因这个城市时而发生的危机趋于缓和。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调侃地写道：“我如此喜欢德国，真高兴现在有了两个”。

但是共产主义集团并非如其外观那样稳定。东柏林人民坚持不懈地追求西方自由。历史学家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有这样的描述：“难民不断到来——有跳窗来的、有剪断铁丝网来的、有从墙底下挖地道来的，甚至还有乘气球越墙过来的。有将近200人在试图越界时丧生。而在苏联集团内部，共产主义制度摇摇欲坠。东欧国家越来越落后于它们的西方邻国，而且它们对此很清楚。新技术被证明更适合于西方的个人自治和经济创业精神。到了1989年，如上一代共产主义人士或许会说的那样，苏联集团内的矛盾愈益升级，其严重程度已超出柏林墙本身。”

本文集历数了柏林墙倒塌的经过及其原因，作者中包括数位主要学者，一位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那时持有不同政见要有极大勇气），以及一位亲眼目睹了东欧各地形形色色的墙倒下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荣幸地把本书奉献给读者，希望今天享有自由的人们能始终珍惜自由，也希望那些尚未享有自由的人们能从发生在仅仅20年前的事件中获得鼓舞。

-----  
迈克尔·杰伊·弗里德曼（Michael Jay Friedman）是国际信息局出版部主任，拥有政治与外交史学专业博士学位。

## 走向 1989 年的历程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  
作者：弗里茨·斯特恩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的开通，是那个充满奇迹的一年中人民重获自由的最激动人心的标志；中欧政治生活中原本难以想见的事情在这一年几乎变得司空见惯。东欧和中欧的百万人民举行了反对当权者的和平抗议活动，共产主义制度似乎日落西山。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欢欣鼓舞，而对美国人民来说，柏林那道恶魔般的分界线的结束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贯推行的遏制政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护了西柏林人民乃至西德人民的自由；昔日的对手逐渐相互靠近，变成了亲密的朋友。

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柏林墙的由来。1945 年，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苏联和英国将德国分成三个（后来加上法国变成四个）占领区，并且将旨在负责所有占领区主要决策事务的同盟国管制理事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设在柏林。由于苏占区是在柏林市四周，因此，柏林——其本身也被一分为四——变成了红色海洋中的孤岛。本来已经因苏联从 1944 到 1945 年在东欧的举动而受到威胁的同盟国的团结，逐渐以冷战的开始而告终。这种结果不是任何一方所希望的，但各方都在其中起了作用。到 1948 年，当共产党在坚守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掌权后，西方盟国放弃了在德国同苏联成功进行合作的希望，并展开了从现在来看相当审慎的建立西德民主政体的准备。1948 年 6 月，针对盟国支持将德国马克作为新的德国货币（甚至在西柏林）发行的举措，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对西柏林实行全面封锁，估计意在阻挠西方成立西德国家，或至少要将整个柏林市置于苏联的管制之下。美国和英国为避免军事对抗，决定采取一项大胆行动：向西柏林市大约 200 万居民空投物资。柏林空运（Berlin Airlift）辉煌展现了为民主目标而和平动用的英美威力。在这场耗资巨大的行动中，美国人民得以倚赖以社会民主运动领袖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市长为首的西柏林人民的坚强意志；这位市长是战后德国第一位赢得美国人民敬重的政治家。1949 年 5 月，苏联同意接受一个象征性的回报，结束封锁。这是西方盟国在军力部署薄弱时期取得的一大胜利，因为到 1948 年，驻扎在欧洲的大部分美国军队已撤回国内，而大批红军仍然驻守中欧各地。

在冷战期间，柏林始终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高危点；它是那些想要摆脱经济日益衰败的独裁统治到西德寻求生活和行动自由的东德人的逃生门户，而当时实行有社会责任感的市场经济的西德正在经历着“经济奇迹”。（西方盟国的援助帮助推动了西德的复苏，而苏联却要求东德赔偿，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已经衰败的国营经济。）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任期 1961-1963 年）是认识到这个从共产党东柏林通向西柏林的惟一开口对东德政权构成真正威胁的人士之一。他还认识到——正如他在发生了“猪湾事件”（Bay of Pigs，美国支持被卡斯特罗政权驱逐的流亡人士反攻古巴未果）并担心苏联报复时所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会发生，那么它将在柏林打响。斯大林的接班人，性情暴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也认识到，东德人口外逃将令东德政权无法承受，而东德政权当时一再要求苏联采取强硬措施堵住这个开口。

从 1960 年到 1961 年，逃离东德的难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堵住人口流失显然势在必行。1961 年 8 月 13 日，东德方面终于得到了苏联的首肯，筑起了这道丑陋的大墙，将柏林市一分为二。西柏林居民虽有自由但被围困，并往往与亲朋好友隔绝。东柏林居民则长期丧失了自由，被挡在这道以典型的双关语方式被正式称为的“反法西斯”

（Antifascist）墙的背后。美国当即的反应比较平和，令西柏林当时年轻的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西柏林普通市民大失所望。由此，东、西柏林便变成了两个对立制度相互较量的舞台。西柏林繁荣发展，不断得到美国政府和民间援助的支持，并受到象征性的盟国驻军的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柏林走出了斯大林时期的阴霾，但就物质生活而言——且不说生活在秘密警察当道的社会中的压抑，东德是一个虽在变化但仍然贫困的社会。

柏林墙让西方领导人和许多西德人随时意识到德国的非自然分割状态，但他们策略地接受了这点，并集中精力建设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西方大国满足于通过谈判达成的措施缓解柏林墙所造成的多种匮乏。与苏联缓和关系成为西方的希望所在，这一政策以多种形式得到体现。1975 年，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与苏联及其盟国达成了《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Accords）。这套协定的前两项重申，不得打破当时既存边界，从而使战后中欧地区业已形成的边界合法化。这套协定的第三部分被通称为“第三组”，它规定，所有缔约国都应尊重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民权。随后组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使苏联获得了重要的保证。至于协定的“第三组”，尽管两方领导人最初均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驱动作用，但必须要提到——特别是为了理解 1989 年——它为东欧和苏联的不同政见运动提供了道义力量和些许法律保护。

苏联坦克屡次镇压在其卫星国出现的反抗当权政府的抗议暴动——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以及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在《赫尔辛基协定》达成之后，由静悄悄的、英勇的、非暴力的异议人士组成的一些团体——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Charter '77）——成为了苏联独裁统治范围内的一支强大得多的力量。公民社会开始在这里从底层萌发——也许是受到了后来被哈维尔称之为的“无权者的权力”意识的感召。然而，尽管这些团体令人钦佩而且十分重要，但单凭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压制状况的。这种改变需要最高层的换班，而此时恰恰惊人地、甚至史无前例同时出现了一批精神和政治领袖。他们深知生活在僵滞中的死寂——没有自由，没有创造力，一贫如洗。

甚至共产主义阵营的成员也对莫斯科的铁腕政策产生反弹：1975年，规模可观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通过他们所称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提出对莫斯科的非议。在这种新思潮下，过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俯首帖耳，甚至在马列主义最恶劣的形式——斯大林主义——当道时也是如此的西欧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某些基本原则决裂——例如承诺同民主政党合作，从而放弃了过去宣称的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制度国家中惟一最高权威代表的信条。欧洲共产党人此前也已对苏联1968年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公开提出批评。或许，像很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假象，一种计策。但它至少是一种预兆。

波兰——苏联最大的卫星国——有着自身独特的血泪史：先是遭受德国占领，而后又被苏联“解放”。过去被周边欧洲大国瓜分的历史形成了波兰特有的敢于反抗的民族抵抗精神。战后的经济萧条引发了对波兰共产党当权者及其可恶的俄罗斯主子的公开抗议示威，其中1956年起义是一次最公开反抗，此外还有1970年的罢工和示威活动。然而，尽管如此，如同整个苏联集团的情况一样，靠苏联坦克撑腰的压制得以继续。

随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978年，克拉科夫教区的红衣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被选为教皇。一位波兰教皇！这在天主教会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可能也是历史抵达一个骤然开放阶段的又一迹象。无一兵一卒的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教皇，几乎瞬间给波兰人民点燃希望。1979年，他在以教皇身份首次访问波兰时，对前来寻求与他祈祷的数百万人说“要有勇气”。他在波兰成为最高道义权威：极富魅力、极富人性、然而又被赋予天主教会的光环与威望。（1979年，在教皇访问波兰一个月之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教皇的影响力非常明显。）他希望将东欧从提倡无神论的让灵魂死亡的共产党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他对西方自由社会的深深疑虑直到后来才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苏联的所有卫星国，其实包括苏联本身，都遭受着经济匮乏落后之苦；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是促使正在探索建设公民社会的人民抗议示威的导火索。罢工时时有发生，但影响最深的莫过于1980年8月14日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爆发的大罢工。在罢工领导人、工会成员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从华沙召集的支持罢工的人士中有两位知识分子，一位是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Bronislaw Geremek），另一位是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领导这场罢工运动直到九月份结束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Inter-Factory Strike Committee）逐渐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团结工会”（Solidarity），向此时已惶惶不安的政权发出挑战。从那以后，团结工会席卷波兰全国——这是共产党国家中的第一个自由工会，而且也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基于鲁莽的浪漫激情而是以政治审慎和杜绝暴力为指导原则的这样的组织。团结工会、工人和知识分子携起手来，展现了传统的社会民主希望，这种希望在几年里一度成为无声的主导力量。团结工会是公民社会的缩影，号称有几百万成员，直接威胁着苏维埃制度的存在。1981年12月13日，波兰最高领导人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大将宣布施行戒严法，并关押了团结工会领袖，希望以此化险为夷。但经济的持续恶化和民众不屈的意志，最终迫使共产党通过1989年2月开始的圆桌谈判让权。由此，谈判桌的形状也成为从波兰开始的共产党相继让权的和平谈判的象征。在波兰首次举行的半自由选举中，马佐维耶茨基成为这个原共产党国家选出的第一位非共产党人总理。（毫无疑问，波兰教皇在上述历史变革中发挥了无形的作用。）

然而，决定性的人物还尚待出现。1985年——在多年的高龄领导人之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当选为苏共总书记，他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年轻，而且与他们极不相同。生长在苏联体制下并从这个体制中上升的戈尔巴乔夫，对这一体制的严重缺陷了如指掌。他以全新的思维开始执政，深知苏联迫切需要经济领域的改革（perestroika）和公民社会的开放（glasnost）。他的构想是，让一个经过改革的共产党俄罗斯在他所说的“欧洲共同家园”（Common House of Europe）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很明显，他的构想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势不两立的共产党教条分道扬镳。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美国的威力；他知道罗纳德·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任期1981-1989年）发出“邪恶帝国”的谴责，并启动了后来难产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他也听到了里根发出的“推倒这堵墙”的大声疾呼。正是这两位领导人对爆发“核大屠杀”的担忧导致签署了1986年和1987年的重要裁军协议。1986年，戈尔巴乔夫还把被流放到高尔基市的优秀天体物理学家和民权先驱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请回莫斯科，这个举动激励人心地体现出他对人权的承诺。两年后，他将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降低了军事在苏联政策中的分量。从一开始，他就策略地并最终大张旗鼓地摒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正是勃列日涅夫主义规定，苏联在卫星国共产党的地位受威胁时予以干预。戈尔巴乔夫希望卫星国

走上各自的改革共产党体制的道路，既无苏联坦克的保护，也无其威胁；他的构想打开了通向 1989 年的道路。最终，戈尔巴乔夫没有成为自己国家的成功改革者，但他使各个卫星国的自由解放成为可能。

由团结工会所显现的苏联集团内的动荡也出现在其他地方，甚至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东德保守的领导人任何自由倾向继续疑虑重重（甚至禁播戈尔巴乔夫的讲话）。1989 年秋，从东德一些教堂开始的和平守夜活动很快在几个大城市发展成和平抗议游行。10 月 9 日，莱比锡大约 7 万名市民和平上街游行，高举“我们是人民”的标语牌，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们当时明知政府已经调动军队，并在当地医院增加了血库储备；他们也像各地的抗议群众一样清楚，共产党政权仍然掌握着镇压手段；仅仅几个月前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就是证明。

然而，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具有感染力，它已不可再被压制。同年六月，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边境实际已经开放，这意味着，当时能够很方便地前往共产主义“兄弟”国家匈牙利的东德人，不用翻越柏林墙便能经由奥地利到达西德。还有些东德人到西德设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大使馆避难，不被安排前往西德就绝不离开使馆驻地。东德人显然置危险于度外，在国外，甚至更勇敢地在国内，行动起来。11 月 9 日，柏林墙的开通标志着第一场和平的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德国革命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可能未充分得到他们的西德兄弟的肯定。

到 1989 年底，苏联的卫星国已赢得自由。过去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可能发生的事——以和平方式推翻苏联统治——成为现实。历史学家将围绕这场解放运动的种种元素和方式进行长期辩论，但似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是一个始料未及的连环历程：我倾向将它视为道义力量的无声合谋。在柏林发生的事件是西方——进而也是美国——的理想赢得胜利的标志和现实。

我仅对种种内在相关因素作了某些简略提示，它们仍有待探讨。在法国大革命爆发 200 年后，发生了一场极为不同的革命，旨在创建一个新欧洲，而且这一次，在历史善意的巧妙安排下，顺应时代的领导人和有勇有谋的人民同时站出来。当时那种充满希望的气氛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也可能因如此之美，仅可昙花一现。基于很多原因，例如暴力民族主义的抬头，使一些地方的现实情况很快急转直下，再次发生流血。但先例已经创下——一个重申“无权者的权力”的成功先例。我不相信那些日子所点燃的火花永远熄灭：是否可以认为，千百万伊朗人民走上德黑兰街头，要求过一种不同的、更好的生活——虽然是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就正是那一先例的再次发扬光大？

---

弗里茨·斯特恩 (Fritz Stern) 是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荣誉教授，是现代欧洲史、特别是德国史史学家，获得过多项国际荣誉和奖励。他的著述在美国和海外得到广泛出版发表；最新著作是《我认识的五个德国》 (Five Germanys I Have Known, 2006 年)。他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Richard Holbrooke) 任美国驻德国大使期间，曾于 1993 年到 1994 年担任美国驻波恩大使馆高级顾问。

## 未来尚待见分晓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作者：罗伯特·利伯

重大事件本身能够自成气候。1776年的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1917年的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s）以及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结束迄今都仍然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其政治、文化、和历史意义也继续受世人辨析。柏林墙的开通恰如其分地属于这类事件；它的意义和影响在20年后仍在产生回响。欢欣鼓舞的东柏林人在1898年11月9日晚上大批涌入西柏林的景象，不仅在这个城市的人民的脑海中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且也是一种更加深刻的转变的象征：德国的和平统一；完整和自由的欧洲；曾经威胁把美国、苏联、及其各自盟国卷入灾难性冲突的世界范围内冷战的结束；也许最重要的是，它有力证明了这样一点：只要给予人民选择的机会，他们将要求获得政治自由。

不仅是德国人，凡经历过冷战年代的几乎任何人，都仍对一些重大时刻记忆犹新：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空运（Berlin Airlift）；朝鲜战争（Korean War, 1950年至1953年）；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太空卫星“Sputnik”；1961年8月筑起柏林墙；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Cuban Missile Crisis）；越南战争（Vietnam War）；以苏联为首的对匈牙利（1956年）和对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入侵；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领导的1985年开始的苏联改革。

我清楚地记得，在柏林墙筑起仅仅几年后的一个12月的阴冷的下午，身为年轻研究生的我，步行通过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的情景。各种障碍物、警告牌 [上面用德文写着：“小心，你将越出美国管辖区”（Achtung, Sie verlassen den Amerikanischen Sektor）]、面无表情、警惕戒备的东德边界警卫，再加上“人民警察”（volkspolizei）——这一切构成了堪称约翰·勒卡雷（John LeCarre）小说的情景。[勒卡雷的小说《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确实抓住了那些年代的特征。] 我还记得，在访问东柏林的时候遇到一些东德学生，其中包括一位充满理想、才华横溢的物理专业学生，他深信他所处的制度所体现的理想，但渴望有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社会主义。不到两年后，他与他的朋友们因试图抗议东德军队参与镇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而遭到逮捕和囚禁，而我则在20多年后柏林墙奇迹般地打开以前，始终不曾再见到过他或他的家人。

柏林墙的崩溃出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原因，但无论什么原因，都无法减轻人们对这一事件发生得如此突然与和平所感到的诧异或震惊。从某种角度而言，人们的不满行动由来已久。自从二战后在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建立了共产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以来，无数人设法从东部搬迁到西部（例如我的另一位朋友和他的家人是通过在尚未分割的柏林市乘坐轻轨列车进入西部的）。1961年8月以后，人们要冒着危险——有时是生命危险——这样做。他们离开家人朋友，以便寻求更好的生活、追求西方的物质优越和柏林墙另一边的个人自由。在最后几个月里，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开放，数以万计的东德人经由这两个邻国逃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局没有能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阻挡这一潮流，驻扎在东德的40万红军部队没有——在1989年没有——予以阻止，没有拯救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

实际上，柏林墙的开放还只是压缩在一个极短暂时期中的四大历史性转变之一：一个分裂的德国和一个分裂的欧洲从此结束；源于欧洲的冷战冲突告终；苏联共产党体制及其几乎所有追随者崩溃；苏联解体为15个制宪共和国。这些非凡的转变激发出巨大的热情与乐观情绪。

## “历史的终结？”

柏林墙崩溃后所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急剧变化的开始。前华沙条约(Warsaw Pact)国向民主化和摆脱国营经济转型——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最引人注目，同时也遍及整个地区。俄罗斯联邦(The Russian Federation)及其原先的14个共和国也采用了民主政府形式，并进行经济转型，不过许多国家取得的成效不尽人意。在世界其他地方，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的浪潮似乎预示着一个光明的未来。这种乐观情绪从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及《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书中得到体现。他认为，这些划时代的变化明显说明，自由民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秩序是现代社会的唯一可行的选择。

遗憾的是，这些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主导地位没有像在柏林墙刚刚开通时的兴奋中被人所认为的那样确定。对一些国家来说，建立和稳固新制度的问题比原先预料的要多得多。东欧和波罗的海许多国家成功地实行了痛苦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尽管这个过程本身有时漫长和困难重重。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国家及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以及非洲，这个过程步履艰难。受极端民族主义驱使的民族冲突爆发，选举有时仅有民主的外表而无实质。

在俄罗斯本国，戈尔巴乔夫总统(任期1985-1991年)与叶利钦总统(Boris Yeltsin, 任期1991-1999年)最初领导的民主化经受了转型动荡与经济崩溃的沉重压力。从1999年起，俄罗斯的体制变得更为稳定，然而却逐渐走向半专制化；尽管有着民主的形式，但由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Vladimir Putin, 任期1999-2008年; 从2008至今任总理)及其同僚当政的俄罗斯，被《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称为“世上最为罪恶、腐败和官僚化的国家之

一”。目前，俄罗斯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享有比当年在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下多得多的自主权，但这一切都是在体制局限范围内，而这个体制扼杀独立政党与法治，缺乏独立的司法系统，由裙带关系掌控主要企业，并垄断着电视与主要新闻媒体。

即使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已经扎根的地方，当初的那种热情和无限乐观也已减退。有些地方——例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问题是腐败和国家无力胜任职能。东欧国家殷切盼望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愿望，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年代里对坚持走民主和经济转型之路起到重大作用。有关法治、文官指挥军队、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政治自由和问责制等要求，在转型时期以及对于艰难应对国内外各项挑战的申请国来说，最终成为了宝贵资本。

这里有必要对自由与非自由民主加以区别。自由民主所要求的不仅是举行选举和具有某些正规的民主机制（议会、总统、法院），而是也要有新闻自由、法治、独立的司法、少数人的权利、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党派与个人以和平方式通过竞选担任公职的能力、公民社会体制发挥作用、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不完全取决于政府。非自由的民主〔这一用语系由著名记者、编辑和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创造〕意指一种制度，它虽有选举，但公民自由、公民权利和一个真正民主社会中的许多层面都受到严重限制或完全不存在。刚刚脱离专制制度并受到民族和宗派分裂影响的社会，尤其容易出现这些内部冲突。

即便在没有严重腐败与政府无能问题的地方，怀疑情绪依然存在。在前东德最近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惊人的57%的人为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辩护，甚至那些承认其种种弊端的人现在也称“那里的生活好”。当然，这里夹杂着日常生活中必然会有的挫折烦恼所导致的错位的怀旧情绪，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升时尤其会这样。但心态以及历史也与之相关；如何解释那些为专制制度开脱的表现，需要有一份对那些心态和历史经历的设身处地的理解。东德人民过去不习惯自由社会中的挑战、风险和生活机遇。他们曾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了56年：从1933年至1945年受纳粹统治，而后直至1989年前受苏联强加的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因此，要适应在自由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中的生活，也许需要经过一代人的变化。

人们希望事物一好百好：自由、人民主权、平等机会、条件平等。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教授在他的《民主的好名声》（Democracy's Good Name）一书中指出，民主概念本身历来结合着两种相互关联但有时相互对立的观念：自由权利——例如个人自由——与人民主权。这两个观念能够、也确实会发生冲突——例如，假如大多数人支持的政策是限制个人自由或甚至压制、限制社会某些成员的权利。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能够通过宪法规定的权利防止出现多数压制，并通过保持独立的司法系统使个人有上诉权利来解决这种矛盾。

更广义地看，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蕴含着某种必然的对峙。市场经济有助于维护个人自由，但它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差异。这种不平等反过来会与大众平等和社会团结的观念相抵触。

挑战也会来自外部。如政治科学家阿泽尔·盖特(Azar Gat) 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期刊发表的一篇被广为引用和颇有争议的文章中所说，专制性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对自由民主的支配地位构成了新的威胁。它们代表着另一现代化途径。正如战胜其在20世纪的前身——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曾依靠美国对欧洲民主国家的援助一样，未来同样需要美国为了民主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积极和持续地发挥作用。

在这场竞争中，民主国家之间的观点不一致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这些国家经常在重要的决策问题上——例如：推广民主、国际经济政策、应对核扩散威胁的最佳方式、瘫痪国家、民族冲突、以及践踏人权等——持不同见解。尽管有呼吁主张通过民主国家联盟

(League of Democracies) 弥补联合国、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在处理共同面临的国际问题时的不足，但是，如何划分自由与非自由民主国家的界限相当困难，很少有国家愿意把这一新组合置于自己对区域性组织、其他机构或定义更具体的国家利益作出的承诺之上。

总之，在柏林墙崩溃20年后，与其说历史已经结束、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注定胜利，不如说未来尚待见分晓。尽管如此，人们有理由感到乐观。从某种程度而言，不仅是过去而且也包括将来，不仅是柏林墙的崩溃，而且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冷战的结束、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的成功、民主化在世界许多地区断断续续但确有进展、以及伊朗人民争取自由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它们都展示：对政治自由的渴望是一种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基本诉求。它的成功不是必然的，但正如历届美国总统从——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到杜鲁门(Harry Truman)、肯尼迪(John F. Kennedy)、里根(Ronald Reagan)、克林顿(Bill Clinton)、布什(George W. Bush) 和奥巴马(Barack Obama)——所宣告的那样，争取自由和民主是人类固有的愿望。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的一句话预示了今天世界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在1787年历史性的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结束后，曾有旁人问富兰克林，新的美国将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对此他回答说：“是共和国，如果能保持的话。”这番话对全球自由社会和市场经济体的未来也相当适用。尽管它们的全面胜利并非预先注定，但通过努力与执著追求，它们继续有着不断持续与发展的光明前景。

-----  
*罗伯特·利伯(Robert J. Lieber) 是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政府与国际事务专业教授，撰写和编辑有15本论述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书籍。他的著作发行与讲学甚广，他也被美国和国外电视台及广播电台聘为嘉宾。*

## “我将终生记得那一天”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  
作者：亚当·米赫尼克

在1989年，没有人料到共产党政权垮台——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任期1981-1989年）在西柏林发出的“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的呼吁被视为是冷战言辞的回声，而不是现实的政治计划。

然而，柏林墙被拆掉了。

我将终生记得那一天。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领导人正在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那时候波兰已由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当政，他是苏联集团国家中第一个非共产党人总理。那天下午，我应邀与西德外交部长汉斯·根舍（Hans Dietrich Genscher）会谈，讨论未来几个月的发展前景。正在我们交谈中，一位助手走进来，递给根舍部长一张纸片。根舍读完后看着我说：“柏林墙边界检查站已经开放。”我们有意思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急忙赶到《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由米赫尼克和其他新闻记者及政治人士创办的民主报纸——编者按），为报纸头版写了几句评论。我指出那是一个伟大的节日：在人类与铁丝网的持久较量中，今天人类战胜了铁丝网。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波兰都支持正在迈向自由的德国人。我们不断高呼：“Ich bin Berliner... Ich b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我是柏林人。”）

表面上，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但它有些独特。它的政府由政党统治，典型地无能、腐败，警察监视无所不在，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然而，它特殊的地方是，另外存在一个民主和富有的德意志国家以及在东德领土上驻扎着苏联军队。过去曾有一句关于普鲁士的话说，它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东德不是一个有苏联驻军的国家；它是一个为苏联驻军的国家。那是东德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保障。

1989年，曾经在1953年镇压工人起义从而拯救了东德政权的苏联军队接到新指令。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推出了改革政策（*perestroika*）——实际上是在脱离基于冷战逻辑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拒绝接受这一新政策。他的同党曾说：“我们应该仅因为邻居换了他家的墙纸而换我们自家的墙纸吗？”

但是东德人也不喜欢旧墙纸。1989年6月20日，在匈牙利外交部长久洛·霍恩（*Gyula Horn*）与奥地利外交部长一起剪开两国边界上的铁丝网后，东德人开始通过匈牙利涌入

奥地利。不久，那些不愿出走的人们开始在东德上街游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新政策让他们看到了机会，东德的路德教堂成为示威者的聚会场所。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准确指出了导致昂纳克政权灭亡的两个因素：戈尔巴乔夫和教会。

1989年10月，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柏林期间，人们高喊“戈比！”（Gorby）并齐声呼喊“我们是国家！”。后来，这个口号改变为“我们是一国！”

因此，柏林墙在实际倒塌前，已经在德国人民心中倒塌了。实际事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柏林后不久。1989年10月22日，昂纳克被推翻；11月9日，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SED）新闻宣传主管兼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我们决定发布一项条令，允许民主德国每个公民可从任何边界检查站出国。”稍过片刻，他补充说，条令“立即”生效。

如果这是沙博夫斯基的一个口误，那么它是德国历史上最有意义和最漂亮的口误。这项宣布一经发出，柏林人立即带上槌子和凿子开始拆墙。不可想象的事情成真了。德国的难题突破了。

柏林墙的倒塌大大促成了整个集团的共产党体制的垮台，但它并不是第一个决定性事件。这一过程——从华沙的角度来看——早在1980年8月就已经大规模开始了。当时，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大罢工打破了共产党专制统治——也就是共产党所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地位。那是一个非凡的事件——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出严正警告。那是共产党在道义上的彻底失败。柏林墙真正是从那时候、从那里开始倒塌。波兰圆桌会议（The Polish Round Table）的让步和随后1989年6月半自由的选举都是对柏林墙的重锤打击。其他事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举人权旗帜并争取“富有人性的缓和”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任期1977-1981年）所实行的政策，带来了一场苏联无法取胜的对抗。它也无法战胜向“罪恶帝国”发出挑战、使苏联加入到无法取胜的军备竞赛中的里根总统的政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传导基督教中倡导的人类自由与尊严，与基于暴力和谎言的共产党教条针锋相对。这一系列事件——加之苏联在技术发展上未能与美国并驾齐驱以及它在阿富汗的困境——导致戈尔巴乔夫采取了苏联军队不再支撑东德共产党政府的新政策。或许，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位总书记对世界作出了无人可比的巨大贡献——尽管废除共产主义肯定不曾在他的计划之中。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后雅尔塔（post-Yalta）欧洲格局的终结；标志着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和苏联政权万年长的信仰的终结；标志着针对德国人推行纳粹主义和发动战争而实施的惩罚的终结；它还标志着民主欧洲所受的耻辱——一个伟大的城市终日处于铁丝网和边界警戒塔楼阴影笼罩下——的终结。

但是，打开柏林墙和共产党政权的终结仅仅只是一个方面。正如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与波兰1989年6月选举形成正反对比一样，中欧的天鹅绒革命也在罗马尼亚的血腥事件和前南

斯拉夫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展现出阴暗的一面。天鹅绒上有血迹斑斑；而血腥味迄今仍在欧洲残留。我在许多地方感受到这点——例如柏林墙倒塌后在德国几个城市发生的难民住所被焚烧事件。关于德国统一的反效果著书立说甚多，在此无需赘述。但我记得从一个德国朋友那里听来的这样一件轶事：统一后不久，一个东德人与一个西德人在柏林相遇。东德人说：“欢迎！我们是一个国家。”西德人大笑着回答说：“我们也是！”

虽然我是一个没有恐德症的波兰人，但这个笑话至今仍在我的脑际回旋，特别是我注意到有大量德国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对德国历史的批判性思考，转而专注于外界对德国人的伤害——往往还伴随着对德国人给波兰人造成的伤害的道德相对论。令人担忧和悲哀的是，有些人竟可以轻易地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将波兰人和犹太人赶出家园与同盟国在德国战败后下令驱逐德国人之间化等号。伴随这种思维转变而在一些德国精英人士中出现的令人难堪的投机和盲从，也同样令人悲哀。

我在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中注意到类似的现象，但在哪里都比不上在德国危险。

换句话说，虽然欧洲在柏林墙倒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越变越好，但是它并没有成为充满宽容、相互尊重，邻里相爱无间的桃源世界。欧洲大陆仍然布满着地雷、陷阱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威胁。

然而，在这二十年之后，我仍保持乐观。为什么？因为我别无选择。

-----  
亚当·米赫尼克 (Adam Michnik) 是波兰最大日报《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 主编。1968年至1989年，他是波兰民主反对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身为历史学家、散文家和政治宣传家，曾担任几个地下刊物的编辑，并因从事民主活动而多次被捕入狱。从1980年至1989年，他担任独立团结工会组织 (Solidarity) 及其领袖莱赫·瓦文萨 (Lech Walesa) 的顾问。1989年，他参加了最终导致波兰共产党体制终结的波兰圆桌会议谈判。米赫尼克著有几部著作，包括《自由书简》(Letters from Freedom)、《教会与左派》(The Church and the Left) 以及《狱中信札及其他文选》(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利雅娜·安德森

## “朋友，那些的确是难忘的日子”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之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  
作者：安娜·胡萨尔斯卡

波兰一个古老的谚语说：“你的观点取决于你的立场。”我们东欧人对柏林墙倒塌的看法是这个谚语的最好说明。以下是我的看法——它带着对波兰历史有同情理解的烙印。

第一：什么是柏林墙？

它意味着很多东西，其中之一是，它是一个象征。从墙的两侧所看到建筑结构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显示着被分割成苏联控制区和非苏联控制区的欧洲——由1945年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注定的结局。

在墙的西面，人们可以触摸它，也可以在上面涂鸦，还可以登上高台看“东部”。柏林墙也是美国总统的讲坛：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在这里发出与这座被包围的城市休戚与共的声言：“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罗纳德·里根则向苏联领导人大声疾呼：“戈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

从墙的东面看去，它是灰色而压抑的。我们知道（但看不见），在上方布满铁蒺藜和刀碴的钢筋水泥墙的那一边是7公尺宽的铺着碎石的巡逻区，还有——我们被告之——地雷区。

尽管这堵墙环绕西柏林（法国区、英国区，美国区），但它象征着对半个欧洲大陆的包围与束缚。

对于我们东欧人来说，最具压制性和最难忍受的侮辱来自一堵剥夺权利之墙：

共产党的法律之墙禁止我们自由前往被统称为“西方”（今天仍然如此！）的世界民主地区——惟恐我们识破其政权的谎言。

共产党审查制度之墙让我们几乎不能读到除其宣传之外的任何东西——惟恐我们受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影响。（未经审查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只能偷运进来，但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

共产党的干扰之墙用持续不断的噪音不让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自由欧洲电台（The Radio Free Europe）、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等外国电台的广播——惟恐我们听到世界和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件的真相。

但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墙。这堵墙迫使我们生活相互颠倒的两个世界：在家里和在亲朋好友中，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在那个虚假但却日渐熟悉的另一世界里，我们要戴上驯服的面具。成为双面人的训练很早就开始了，在幼儿园，我们一边读《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一边学习政治口号；一边玩玩具熊，一边学剪锤子镰刀剪纸。

第二：柏林墙倒塌的日子——或那些日子——也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1989年11月9日被视为是半个欧洲所经受的不公正压迫宣告结束的最重大日子。但是，早在1980年，当波兰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成立并赢得罢工权利时，柏林墙就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另外，有人或许认为，被雅尔塔会议分裂的欧洲直到2004年8个东欧国家被接纳入欧盟（European Union）时才真正复原，尽管对生活在白俄罗斯的人而言还并非如此。

即使是在奇迹迭出的1989年，东欧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值得注意并且意义非浅：共产党政权与政治反对派第一次举行谈判（4月间在波兰）；第一次举行半自由的选举（6月4日在波兰，但同一天坦克碾碎天安门广场改革梦的消息占据了首位）；1956年布达佩斯起义领导人纳吉（Imre Nagy）和他的助手历史性地被给与恢复名誉（6月16日在匈牙利）；基于12年前七七宪章运动（Charter '77）的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11月间变得如火如荼，一个月后，前持不同政见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出任总统；最后，罗马尼亚——这个在此之前似乎最稳定的共产党政权——也在1989年以最血腥的方式骤然垮台。

对那一年的德国历史则可作出具有德国特色的条理化概括：1月19日，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内克（Erich Honecker）宣告，“只要筑墙的理由还在，柏林墙将继续存在50年，甚至100年”；12月19日，西德领导人赫尔默特·科尔（Helmut Kohl）向聚集在德累斯顿的东德公民发表即席讲话，人群高呼“德国，德国”和“我们是同一民族”。

第三：柏林墙的实际倒塌

柏林墙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分隔德国城市的106公里长的水泥结构、68公里长的金属网和302个瞭望塔；它是划分自由欧洲和不自由欧洲的最醒目的有形和无形铁幕的组成部分。

这一铁幕究竟是什么时候打开的？裂缝在匈牙利官员把与奥地利交界处的铁丝网拆除时出现，那是1989年5月。那年夏天，数以千计的东德人驾着最具东德特征的特拉贝特（Trabants）牌汽车（这种东德造汽车以质量低劣闻名，有人说它是硬纸板车），先到华沙、布拉格，然后再从那里前往布达佩斯，希望最终抵达“西方”。因此，当匈牙利人在1989年9月11日向东德公民开放边境，让他们自由出境时，大约15000名东德人弃东德而走。柏林墙堤坝出现了凹陷，一个严重的凹陷。三星期后，东德当局声称基于“人道原因”，允许一辆载有近千名东德难民的专列从华沙开出，途经东德，开往西德。不久，又有更多专列从华沙发出，总共运送难民7600人。截至11月3日，有4万名东德难民经由捷克斯洛伐

克抵达西德。此刻，堤坝真正开始决口了；柏林墙远不是那样坚固了。

鉴于东德当局一切一丝不苟、刻板和程式化，因此，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最终打开的情形无疑成为一个绝妙的讽刺：它源于一个官僚行政失误。在一个现场直播的电视新闻发布会上，没得到充分通报的共产党领导人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作出了那个“著名”宣布：去国外旅行的禁令全部解除。当有新闻记者追问时，他说，这个决定立即生效，而不是如原计划的那样在第二天实施。至于后来的一切，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不过，在柏林墙崩溃的那天晚上我不在柏林。1989年11月9日我正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编辑室。时报编辑马克思·弗兰克尔（Max Frankel）给了我一份短期实习工作，我想在那里取得独立报纸的工作经验，并将其运用到刚刚民主化的东欧——那里有一个新闻职位正在等待我。这种职位在当时的波兰成为可能，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来得多么迅疾。

在柏林墙崩溃的几天前，一位波兰女演员在电视新闻中提到我们的半自由选举时宣布：“女士们，先生们，共产主义于1989年6月4日在波兰结束了。”事实确实如此。随着举行那一选举的决定而创办的《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如人们所说——“是在柏林到海参崴之间的第一份自由报纸”。

在国外生活了15年后，我于1989年春回到波兰，成为《选举日报》编辑部成员。我们新获得的自由简直令我难以置信，而我的同事们不但知道它千真万确，而且期待着会很快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整个苏联集团的崩溃。他们认为，波兰人对此肯定功不可没。我的爱国情结让我感到赞同。

我的记者职责让我希望目睹一切。1989年，《选举日报》国际部是目睹共产主义垮台的最佳位置。

在1989年其余的日子和1990年初的几个月中，我在《选举日报》报道了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尼加拉瓜；而后，我为一份新创立的周刊报道了阿尔巴尼亚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事件。参加过团结工会运动的我，对于东欧全境的其他民主运动有着极高的期盼。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或许是最令人兴奋的经历。那里的“革命”最干净、最顺利，也最有风度，而且非常迅速。那个冬天，布拉格街头的涂鸦中有这样一个简单排列式：

波兰，10年。

匈牙利，10个月。

东德，10周。

捷克斯洛伐克，10天。

实际时间比10天略长，不过那是一个好像一切都可能做到的时刻，那时我们东欧人认为——正如这首歌里唱的：“我们要过我们想过的日子，我们战无不胜！”

我几乎从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直接转到报道罗马尼亚的“流血革命”，而这犹如从七彩云天一下跌入了人间地狱。

我在当时的笔记本里是这样写的：

1989年12月12日，布拉格

人们在瓦茨拉夫广场（Václavské náměstí）广场边跳舞，边唱道：“我们要的圣诞礼物是哈维尔当总统。“他们把鲜花塞进困惑不安的警察的枪筒里。

1989年12月25日，布加勒斯特

皇宫广场（Palace Square）弥漫着来自被烧毁的共产党总部大厦的湿漉漉的灰烬味道。人们一边观看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的电视重播，一边声声重复：“今天是圣诞节，疯子已一去不复返！”

1989年12月28日，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播放一部至今为止一直禁映的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影片：《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

“啊，那些的确是难忘的日子……。”

-----

安娜·胡萨尔斯卡（Anna Husarska）曾在巴黎的团结工会海外办公室担任编辑和译员，也曾在波兰《选举日报》工作。在美国时，她曾在《新共和》（New Republic）和《纽约客》（New Yorker）等杂志任冲突和后冲突地区事务的专职撰稿人，并且是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资深政治分析员。目前她在国际援救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担任资深政策顾问。以上文章仅代表她个人的观点。

## 柏林从分裂到统一：1961-1989 年大事记

本年历表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

### 1961

3月13日 — 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总统会见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保证美国继续提供支持。

6月3日至4日 — 在维也纳会议上，肯尼迪总统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围绕德国自决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六个月后，赫鲁晓夫威胁要另与东德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此举将单方面地改变战后格局，有可能使西方无法进入已处于分割状态的柏林。作为回应，肯尼迪表示“寒冬”将至，宣布了美国常规军大规模增兵计划，并声明将捍卫同盟国进入西柏林的权利。

7月至8月 — 面对大量难民逃离东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8月1日至12日每天有多达2000人逃亡)，东德政府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

8月13日 — 星期天拂晓前，东德警察和军人开始将柏林东区与西方三个区隔离，防止更多人迁移。两天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建造大型钢筋水泥墙，那些试图逃往西柏林投奔自由的人被边防警卫击毙。英国外交部称筑墙“违反柏林四强共管现状，……因此不合法”。《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的社论说，那些人之所以逃往西方，“是因为他们不堪忍受生活在所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羞辱和苦难”。

8月26日 — 将所有边界通道对西柏林人关闭。东德政府只让获得特别许可证的西柏林人通行。其后，又通过拒绝签发这种许可证而实际上关闭了所有边界通道。

### 1962

1月24日 — 28名成人和孩子经由在坚固的大墙下挖掘的通道逃到西柏林，其中包括一名71岁的瘫痪妇女和一名8岁女孩。

6月8日 — 14名东柏林人，其中包括一名抱着婴孩的妇女，在施普雷河上劫持了一艘轮渡。他们在东德边防军的枪林弹雨下安全抵达西柏林河岸。船上的乘务员说：“今天我梦想成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8月17日 — 18岁的彼得·费克特(Peter Fechter)在逃离时被边防警卫击中，成为第50名试图越墙逃亡的遇难者。他那弹痕累累的尸首躺在大墙东边，无人问津；墙西边的人们向对面高喊“刽子手”以示抗议。

## 1963

6月26日 — 肯尼迪总统在西柏林发表了激昂演说，使德国人大受鼓舞，也震撼了全世界。他以如下字句结束演说：“一切自由人，无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

12月17日 — 在圣诞节来临前，西德与东德政府达成协议，允许西柏林人持临时通行证，前往东柏林探望亲人。这是边界关闭以来的第一次。

## 1964

10月5日 — 57名东柏林人通过在一个废弃的糕点店地下室挖掘的133米通道，成功抵达西柏林。通道的挖掘耗时6个多月。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逃亡。

## 1965

12月26日 — 大约80万西德人利用限制得到放松的两周特别假期，前往东柏林探亲访友。但是东柏林人却不得前往西柏林。有两人在逃亡时遭到枪击，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

## 1967

2月2日 — 东德议会另建东德公民制，东柏林居民被包括在内。这意味着德国的分裂将长期化。

2月3日 — 东德释放了四名自1965年以来被押的美国人，这四人因被指控帮助东柏林人逃往西方而遭囚禁。

## 1970年

3月19日 — 前西柏林市长、现任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在东德的埃尔福特会晤。

3月26日 — 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开始举行《柏林协议》(Berlin Agreement)谈判。

## 1971年

1月31日 — 柏林市民20年来第一次可以同柏林墙对面的人通电话。

5月3日 — 柏林墙的策划者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接任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东德领导人职务。

9月3日 — 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签署《四国协议》（Four Powers Agreement），重申所有四国都保留对德国——进而柏林——的权利与责任。

## 1972年

12月21日 — 西德不管部部长埃贡·巴尔（Egon Bahr）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秘书迈克尔·科尔（Michael Kohl）签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基本协议》（Basic Agreement on Relationships），加强商业、外交、文化和旅游往来，使双方关系朝着和解方向迈出重要一步。

## 1975年

10月29日 — 尽管紧张局面依然存在，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意，任何一方都可抢救交界河及交界运河中的溺水者。此前，西德消防队员因遭到东德边防警卫拒绝而被迫目睹一个男孩淹死在分割东西方的施普雷河中。

## 1980年

10月9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重新施加旅行限制，将对西柏林来访旅客的收费提高到每天25马克。

## 1982年

6月11日 —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总统身份第一次访问西柏林时，呼吁苏联朝着长期和平方向作出前瞻性努力。他在向美国军人发表讲话时问道：“为什么这里有一堵墙？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墙这边的自由？”

## 1984年

1月20日 — 经美国驻东柏林大使馆安排，6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作为政治难民跨过边界进入西柏林。

1月24日 — 又有12名东德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东柏林代表处（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in East Berlin）寻求避难。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感到惊惧的是，他们在西柏林也获得庇护。

3月14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因无力遏制东德人涌往西方，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与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之间竖立起第二道墙。西德最初试图利用这一事态发展调整柏林的分界线。《纽约时报》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对柏林没有很大控制。”截至那时，柏林墙在其存在的23年里，已经至少夺走了70人的生命。

## 1985年

3月11日 — 苏联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当选为共产党总书记。《纽约时报》称他为“有风格——和急迫感——的领导人”。

## 1986年

戈尔巴乔夫终止向东欧的苏联卫星国提供经济援助，并最终导致了苏联对该地区军事援助和政治干预的新政策以及在革命席卷东欧时的默许。

## 1987年

6月7日至8日 — 英国创世纪乐队（Genesis）在西柏林举行大型露天摇滚乐音乐会，吸引了东柏林青年到柏林墙聆听。当东德国家警察试图驱散人群时，三、四千名柏林青年齐声高呼“必须推倒这堵墙！”有无数东柏林人被警察打伤或投进汽车。

6月12日 — 里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讲话，疾呼“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里根的一些助手曾认为这句话太具挑衅性。但是里根仍决定这样说。柏林人高声赞同。

12月8日 — 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程核力量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里根坚持使用的关键词语是“信任但要核实”。在冷战敌对方之间的这种日益增进的信任，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德国问题日益成为可能。

12月10日 — 东德国家警察阻挠了和平与人权行动（Initiative for Peace and Human Rights）发起的游行示威计划。

## 1989年

1月18日 — 昂纳克坚称，只要资本主义势力反对他的政权，柏林墙将继续存在“50，甚至100年”。

2月6日 — 一名逃往西方的东德公民被击毙，成为有记录在案的79名遇难者中的最后一位。柏林墙在那年秋天开通。

2月27日 — 东德共产党理论家奥托·汉诺威（Otto Reinhold）发表演说，谴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分析人士将他的观点归纳为“没有必要仅仅因为邻居补墙而自己也要补墙。”

3月8日 — 一名东德青年试图乘自制热气球飞出柏林。他因气球在西柏林采伦多夫坠毁而身亡。

3月12日 — 波兰西部什切青附近捕渔权问题的争端暴露了东欧集团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存在的分歧。这在后来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一个外交障碍。

6月7日 — 在东德举行了被指控带有一系列舞弊行为的地方选举后，人们在东柏林游行示威。有120人遭到短期监禁。

8月8日 — 东德人聚集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东柏林代表处外，寻求庇护。由于人数太多而且拒绝离开，常驻代表设施不得不基于“人的尊严和人道”原因而关闭。

8月19日 — 大约900名东德人经匈牙利穿过奥地利逃到西德。他们当时在参加一个叫作“拆掉它，带走它”（“Tear It Down and Take It With You”）的野餐活动，参与者受鼓励剪开边界铁丝网。大约100名德国人撞开一座大门，而匈牙利警察故作不知。8月一个月，有3000名难民以这种方式逃离。在随后几个星期中，逃离者人数激增。

9月11日 — 东德批评人士在东柏林创立“新论坛”（“New Forum”）。匈牙利举行剪铁丝网仪式，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当月，1万名东德人通过奥地利进入西德。

10月7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官方举行40周年庆祝活动。而数千人在柏林游行，要求民主和自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告诫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政权应支持改革并看到东欧不满情绪的迅速高涨。戈尔巴乔夫预言般地说：“生活惩罚行动过于迟缓的人。”

10月9日 — 在民众反对势力最强大的莱比锡，7万人举行示威。

10月18日 — 担任国家元首和党总书记18年的埃里希·昂纳克被迫下台。他以胆囊手术影响为辞职理由。后来，昂纳克受到德国法庭审判。他的继任是被《纽约时报》称为“非戈尔巴乔夫式”的保守人士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克伦茨保证要实行改革，但结果证明一切都太少、太晚。

10月21日至30日 — 在柏林和德国其他主要城市，数十万群众举行反政府游行。

11月7日 — 东德政府集体辞职，随后整个政治局辞职。示威游行在继续，难民有增无减。

11月9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作出取消旅行限制的不甚明确的宣布后，出乎意料地在当晚开放边界。尽管一些边防警卫要求人们“体会言外之意”并说需特别许可才能通行，但是，来到边界的人数量之多令守卫难以招架。没有出现制止人们通行的命令。几十万人涌入西德。

11月10日 — 边防警卫开始拆除柏林墙，以设立更多通行点。东、西柏林人积极热情地投入其中。

11月11日至12日 — 300万东德公民前往西德参观、购物或探亲访友；有些人在东德寻求新生活。几十万人将库弗斯坦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等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西德报纸增发专刊，列出了4000多个就业机会——许多还包住宿，鼓励东德人留在西德。

11月13日 — 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推选为总理。与此同时，德国各大城市，包括20万人在莱比锡，举行示威，要求改革。“星期一大游行”（“Monday Demonstrations”）持续了几个星期。苏联未加干预。

12月3日 — 克伦茨为首的统一社会党领导层集体辞职。前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昂纳克以及许多其他党的高级官员被开除出党。东德政府残存的权力掌握在来自德累斯顿的改革派政治家莫德罗手中。

12月22日 — 一直是德国分裂的象征的勃兰登堡门28年来第一次开放。赫尔默特·科尔（Helmut Kohl）称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

12月31日 — 除夕之夜，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50万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欢庆新时代的到来。

## 1989 年的新闻尚未传到某些国家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作者：特雷莎·邦德

1989 年 11 月 9 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捕捉到欢庆柏林墙倒塌时的人潮汹涌的场面。这是举世皆知的象征，代表着被共产主义压制性政权所分割的世界的结束。

然而，是这样吗？

二十年后的今天，北韓 2300 万人民尚无任何人得以合法地看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一张照片。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与柏林墙查理检查站 (Checkpoint Charlie) 最相似的地方莫过于北韓与韩国之间的板门店边防站。在那里，被共产主义制度分割的最后一个国家的士兵仍然在虎视眈眈地相互对视。几乎没有人，包括北韓政权在内，愿意在南北韓之间筑墙。然而，北韓王朝式的癡狂独裁者们尤其难以对付。

古巴政权是另一个坚守共产主义、并以此意识形态压制人民的政权。哈瓦那的马莱孔 (Malecón) 海滨大道象征着一座古巴墙：古巴人在此观海，远眺岛外的世界——一个他们不能自由前往的自由世界。古巴人未曾见过合法刊登的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的照片。

这是两起极权共产主义独裁的极端例子。柏林墙的阴影在前苏联一些地区没有完全消失，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是最突出的例子，而在明斯克、阿斯哈巴德或塔什干，没有什么人会忘记导致他们受难的谬误。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但不能表达。

当被问及“异议观点”时，哈瓦那的人或许不知道“异议观点”为何意。而平壤人民则既不知“异议”为何意，也不知什么叫“观点”。

特雷莎·邦德 (Theresa Bond) 是一名分析封闭社会问题的有声望的政治分析人士的笔名。

## 必须捍卫 1989 年的历史业绩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 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  
作者：杰纽斯基·布格季斯基

远在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被打开以前，铁幕已经开始解体。东欧共产主义制度不可救药地走向衰败已有数年时间。一党政权扼杀人权和政治自由，无法兑现实施共产主义的核心根据：经济成就。在 1980 年代，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愈益明显，特别是市场一体化促进了西欧的繁荣，而由苏联控制的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被证明不是取代一体化欧洲的可取之路。

反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抗议运动不时给东欧各地带来震颤，但 1980 年夏季波兰自由团结工会（Solidarity）的诞生则如地震爆发，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虽然团结工会一度被窒息，被迫转入地下，但其成员人数之众多以及其领导层的远见卓识说明，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体制已将为时不久。惟一不能确定的是，这一制度是将猛烈还是无力地死去。

幸运的是，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有继续残喘之力。随着其意识形态的破产，经济上的无能和政治上的不开化，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证明是又一个走进死胡同的试验。与此同时，在全东欧扶持傀儡政权的苏联政权本身已既不再坚信，也不再资源已武力压制“兄弟国家”的人民对多元和民族独立的渴望。

到柏林墙被正式打开缺口时，波兰已经有了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也意识到，制度变革大势所趋，因而也在稳步走向政治多元制。

回顾 1989 年 11 月，人们往往忽视这样一点：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而且也预示着中、东欧国家即将从苏联的统治下获得民族解放。尽管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已经只是一场逐渐被淡忘的噩梦，但面对日益强势的俄罗斯政府而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至今仍在继续。

确实，俄罗斯官员在试图修正 1989 年事件的重要意义——莫斯科声言，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并未占领半个欧洲，并淡化苏联用武力将扼杀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压制性极权制度强加于那些国家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俄罗斯的一些发言人声称，克林姆林宫解散苏联集团是出于善良意愿，并说冷战以平局告终，不承认苏联制度的惨败及其自身的瓦解。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所谓苏联制度仁慈甚至进步的学说如今被用来作为在当前和未来采取强势姿态的理由。有鉴于此，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必须警惕地捍卫 1989 年 11 月的真正历史业绩。

-----  
杰纽斯基·布格季斯基 (Janusz Bugajski) 是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新欧洲民主项目 (New European Democratic project) 主任。他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前不久在慕尼黑任自由欧洲电台 (Radio Free Europe) 资深分析员。

## 西德和美国的不同反应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作者：埃德温娜·坎贝尔

1989年11月9日，我在美国新闻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的安排下去西德作巡回演讲。我在萨尔布吕肯度过一天，然后乘火车抵达法兰克福，在短暂阅读一会儿后，便早早就寝。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并不知道柏林发生的事。早餐时没有人提及。到上午10点钟左右我打开电视机时，每一个频道的画面都是记者站在柏林墙前，身后是正在凿墙的人们。我坐到床上，惊愕地盯着电视。

在一个晴朗、寒冷、世界战略板块发生移动的日子，你会干些什么？我去了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它曾目睹1848年进行的未能如愿以偿的建立统一民主德国的努力。有许多小学生在参观教堂；然而，没有一位导游在介绍1848年的历史事件时额外提到此时此刻就在柏林墙那里，正在开凿着走向统一之路。直到那天晚上出席当地大学的政治学会议以前，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谈到柏林墙开放。

自那时以来，我对在那次西德之行中未曾能去柏林始终心存感激；柏林当时的气氛是独特的。在随后一些天里，我在西德各地有着同在法兰克福相同的经历。我看到，在学术界、政界人士和外交界人士与大多数西德人之间，对柏林墙开放的热情程度有巨大差异。在我真的与人谈起柏林墙时，有些人对局面的发展表示出紧张，甚至恐惧，而许多人则显示得无所谓。

我在很久以前的那个11月的经历，是对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动荡的德-美关系进程的一个重要说明。或许，两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最大区别就体现在对变革的态度。柏林墙的开放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至少自1918年以来，或许完全就是前所未有的——全球政治变革时代。20世纪的跨大西洋模式不再能满足现实，然而，可以理解，在德国，人们仍希望维持这种模式。

西德外交政策有两个基点：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在1989年，这两点是波恩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的“东部政策”(Ostpolitik)以及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长期关系的支柱。1989年11月9日，稳定和可预测的时代结束了，我在那个时候遇到的西德人似乎本能地知道这一点，本能地回避柏林正在发生的现实。

美国人有着不同的历史。我们往往把政治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视作可以把握的机遇，而不是可怕的危机。这可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应变能力过分乐观，过去几年来大西洋两岸的危机也反映了这点。美国人对问题可被解决信念与德国人深信的必须掌握局势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两者都没错。1989年11月9日那天，持续了40年的冷战得以化解是因为盟国共同妥善处理了往往十分紧张对苏联关系。同样，“德国问题”的答案也产生于长达10年的大西洋两岸的战略对话。两国都必须记住，今天全球政治问题的答案只能产生于在新世纪中继续对话的意愿。

---

埃德温娜·坎贝尔 (Edwina S. Campbell) 自2003年以来在美国空军航空大学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s Air University) 任教，此前从事过学术和分析工作。她曾是专司政治-军事事务的美国外交官。她的著述有《北约的协商与共识》 (Consultation and Consensus in NATO) 和《德国的过去与欧洲的未来》 (Germany's Past and Europe's Future)。本文表达的是坎贝尔本人的见解，不代表空军航空大学、美国空军部队或美国国防部的观点。

## 柏林墙倒塌带来新德国崛起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

作者：罗伊·金斯伯格

在柏林墙倒塌 20 年后，很多痛苦景象依然历历在目。柏林人乃至全世界都不会忘记，1961 年在共产党为保存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而筑起柏林墙后那些因为想逃离而遭到杀害的人们，不会忘记从此天各一方的家人和朋友。毕竟，没有人拼命逃离西柏林的自由而投奔东柏林的暴政。

柏林墙是二战同盟国未能就如何处理战败德国问题达成一致的又一说明。苏联人在 20 世纪曾两度受到德国武力摧残，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中立、被削弱的、带有依赖性的邻国。而美国人及其盟国则希望看到一个民主自由的德国，使之成为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和法西斯卷土重来的堡垒。

自从同盟国在 1949 年后对柏林保持占领权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与苏联卫星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一直独立，但不具有完全主权。直至 1989 年至 1990 年柏林墙倒塌、同盟国放弃占领权以及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最终结束。

柏林墙代表着被人为分裂的德国和危险割据的世界。1974 年，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作为学生访问了东柏林。作为一名自由世界的公民，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进入东柏林时感到的畏惧和当我离开时感到的自由——同时还有为那些无法离开的人们感到的悲哀。

15 年后，我匆匆走进课堂，向学生们传递柏林墙倒塌的喜讯。学生们觉得好奇，而不是兴高采烈。他们的经历不同于我们这代人。作为曾为打败法西斯而战的一代人的子孙，我们这代人与那些战争英雄和美国及盟国的战后领袖有着更直接的关联。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以及上世纪 40 年代晚期的柏林空运(Berlin Airlift)，直至 50 年代和 60 年代对共产主义的遏制，西方战胜了共产主义。外交官及俄罗斯问题学者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曾预测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萎缩，其结果确实如此；而遏制政策得以将苏联的扩张主义限于东欧。

战后西德人应受到恭贺，他们制定出民主方针，并成为东德的希望明灯。与其未能成功的民主前身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相比，西德具有两大优势：它具有经济安全保障，进而能够走向繁荣和后来作为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成员所需的民主化；它有着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获得的国家安全保障，进而既不威胁其他欧洲大国，也不受其他欧洲大国的威胁。

今天，统一的德国得到欧盟和北约的安全保障，并且在世界上促进民主与稳定——对很多平民人口来说，这是一个比 1989 年更加危险得多的世界。如果德国能够通过欧盟和北约以及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世界所需的稳定与安全，那么，它就可以回赠曾帮助它获得安全与自由的国家。

---

罗伊·金斯伯格 (Roy H. Ginsberg) 是位于纽约州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城的斯基德莫尔学院 (Skidmore College) 政府学教授，著有《揭开欧盟的神秘性：地区一体化的永恒逻辑》 (*Demystifyi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nduring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 1989年革命令人瞩目的一些原因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作者：罗纳德·林登

如同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一年一样，1989年在欧洲的分裂状态中开始。一亿多人生活在由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控制的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剧作家和人权斗士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身陷囹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和托尔多·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暴政已分别达20多年和30多年之久。在德国，一堵贯穿和围绕柏林市的12英尺高墙，既是欧洲分裂的痛苦现实，也是它的悲哀象征。

到这一年行将结束时，哈维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从巴尔干到波罗的海的各国专制政权被推翻，重新赢得主权的东欧各国人民开始了建立民主和自由经济的伟业。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开放标志着欧洲分裂的结束。

这些事件不仅发生的速度快，而且范围广。但除此之外，它们还有其他重要特征。首先，虽然分析人士和政治人物早已指出共产主义政权的种种缺陷，但这些政权在东欧几乎同时崩溃却是始料未及。此前，某些挑战性事件一般都仅限于某个国家。而这一次，示威抗议和社会要求声浪迅速蔓延——带来了从8月底波兰共产党总理被替换，到圣诞节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被处决的一系列结果。

此外，除罗马尼亚外，这些革命性的变革均为非暴力。东欧政权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外国军队，而是来自本国人民——人民深信，过去40年的政治理念带给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压制。但东欧国家的大动荡所反映的不仅是对失败政策的不满；这些事件表明了合法执政的重要，即：政府赖以执政的是其权利——而不仅仅是权力。东欧人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本国的共产党统治者是“自己的”，而是视其为苏联统治的产物。当在本国推行改革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不以干预相威胁时，东欧各国的派生政权便被本国人民一扫而光。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促成了共产党政权的灭亡和柏林墙的倒塌。一是信息的传播——关于西方以及东欧真实情况的两方面信息的传播。对西欧人和美国人如何执政和生活的真实情况的了解，提高了非共产主义制度的模式的吸引力。虽然有关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在东欧可能还不很具体，但知道这些理念在世界其他地区行之有效，构成了强大的推动力。

然而，若不是东欧人民表现出抓住时机的勇气和远见，认识到承担大破——如同在1989年推倒柏林墙——和大立使命的时刻已经到来，那么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  
罗纳德·林登 (Ronald H. Linden) 是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政治学教授。他于 1976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博士学位，于 1984-89 年和 1991-98 年两度担任匹兹堡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主任。从 1989 年至 1991 年，林登博士在德国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 (Radio Free Europe) 任研究主管。他有多部关于中欧和东南欧的著述，并是《后共产主义时期问题》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副编辑。

## “我们去找袖珍计算机！”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  
作者：安德烈亚斯·鲁德

1989年夏天，在柏林墙倒塌几个月前，我在哥本哈根一个研究安全政策的小型智库工作。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天午餐时都有一个非正式聚会，讨论时事。而那年8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东德政府允许其公民出境，经由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到奥地利。我们目睹出境的人群一天天扩大。当时的局势最起码是很不稳定。一位特别兴奋的同事想预测什么时候这个非常令人惧怕的邻国的1600万居民会完全走空。因此，我们急需一个计算器。

这个小动作反映了当时的情绪。一切犹如世俗国际政治中的童话，令人难以置信。在柏林墙11月倒塌时，到处一片兴奋。一场又一场的和平革命席卷东欧和中欧；对出现无政府状态和暴力镇压的忧虑的预言让位于乐观的现实。导致这一切的各种催化剂似乎都具有明显的道德内涵：人权、对环境的关注、以及专制政权在自身谎言和毫无价值的口号的重压下崩溃。历史正在还其本来面目。

也许，那个怪诞纪念物的倒塌所带来的最重大后果，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的诞生。不再受到超级大国对抗逻辑禁锢的欧洲文化和政治主流由此自由奔放，欧洲人开始以半个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方式进行自我思考。这一壮举的负面结果是南斯拉夫的暴力解体和可怕的“种族清洗”。但德国统一却是柏林墙倒塌的必然结果，柏林作为著名政治、新闻和艺术中心的地位也因此得到恢复。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柏林还保留并吸收了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柏林的影响；柏林先成为美国的一个成功经历，而后才成为欧洲的成功经历。

当柏林墙被打开、简陋的特拉贝特车(Trabant)大排长龙从东德进入西德时，冷战便寿终正寝。投入那场冲突的巨大能量由此释放出来，欧盟扩展到整个大陆，北约将昔日的对手迎接进来，欧洲变得更加繁荣和果敢。随着几十年前不曾料到的各种挑战的出现，各种智库也应运而生。面对这一切，1989年重新开启的欧洲讨论着实可贵，它对大西洋两岸均至关重要，并带来重要成果。然而，即使这一讨论在日益深化，距离得出结论却仍为时尚早。

对此人们不应感到惊讶。1989年，游戏规则魔术般地发生改变。20年后我们仍在努力跟进——边行边创造历史。

-----  
安德烈亚斯·鲁德(Andreas Rude)是美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馆负责安全政策问题的公共事务专家，也是自由撰稿人兼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刊登于丹麦大多数主要报纸。

## 具有现实意义的远见卓识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作者：西蒙·瑟法蒂

20年前，即1989年11月9日在柏林发生的一切——以及其后一年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那个时刻还不十分久远，当年的激情仍可在今天的欢庆中重现。许多人由于曾在被我们称为冷战的“漫长朦胧斗争”中生活得太久，他们将冷战的结束视为奇迹，而不是远见卓识——对邪恶帝国的衰亡、对有着本质缺陷的意识形态的崩溃、以及对经历了两场自我毁灭战争的欧洲的和平崛起的有胆识的预见——的结果。

然而，在一切奏效之后，人们大多只记得这种远见卓识，它的内涵却时而消失在胜利的光芒中，其中包括：面对偶尔挫折时的耐心，面对危险挑衅时的审慎和担起历史悲剧重负的坚毅——1989年秋的一系列事件正是历史悲剧的产物。这种远见卓识在多年中有过诸多表现形式，值得谨记——不仅因为它们有效，而且因为它们对2001年9月11日骤然出现的新的不安局势具有现实意义。

对冷战及其最终结局起了决定作用的这种远见卓识的核心，是美国的一种宏观认识，即尽管美国的强大无可质疑，但昔日远在“那边”的势力已经来到这边，威胁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且有可能再来。诚然，在整个冷战过程中都曾听到要求撤离燃点地区“返回家园”的呼声，它们往往伴随着对衰退不可逆转和灾难将至的警告。但是，美国之所以没有理睬这种呼吁，之所以能够肩负起多重承诺，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宏观认识，即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怎样无人匹敌，都不能长期独立于世，都不能没有在价值观、利益和目标上息息相通的盟友；这样的盟友能以他们的实力、经验和多元协助形成共同的、相辅相成的或者是协调的政策方针。

但是，当年美国的领导作用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仅仅赢得一场战争，而是要在战争变成不得持续的生活方式的欧洲大陆消灭战争本身。因此，1989年11月的一系列事件不仅仅是以美国为首的跨大西洋西方联盟战胜了苏联，而且是欧洲战胜了历史：当欧洲国家告别了武器并惊人地同意逐步将国家主权共同化时，他们将自己重新纳入一个更为紧密的共同体——如今成为联盟，进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富足、稳定与和平。

20年前，有些人以为，冷战的结束和德国的统一会威胁欧洲的团结以及欧洲同美国的牢固联盟。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证明了将美国和欧洲带到20年前那个不可思议的時刻的远见卓识的深度，并推动了欧洲-大西洋机制的扩展与深化；这些机制在继续界定着这种关系。诚然，犹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后来所述，这种远见卓识在冷战期间仅被局限于“半个世界”。今天，那些局限性提醒我们，需要发扬这种远见卓识，从而让其他国家获得机会，赢得和平、繁荣和自由。

-----  
西蒙·瑟法蒂 (Simon Serfaty) 是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负责全球安全和地缘政治 (Global Security and Geopolitics) 项目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主任 (Zbigniew Brzezinski Chair)。他最新的著述是《谬想的设计者》 (Architects of Delusion)，2009 年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出版。

## 柏林墙倒众人推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作者：曼弗雷德·施廷内斯

人们对于柏林墙倒塌带来的地缘战略后果大概有共识：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它的卫星国——包括东德在内——摆脱了受控制状态。东西柏林边界的开放标志着一个从迟疑中起始的进程，这个进程最终在 1990 年 10 月 3 日以德国的统一而告圆满结束——或者，按照正确的历史和法律说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自行解体并加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德国统一的和平实现也可以被视为西方联盟的外交胜利，尤其是最终使莫斯科认可了对二次大战后的政治现状作出的这一根本性改变。

这种结果对欧洲大陆有着深刻意义。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德国面对真正战略对手，采取了其著名的“摇摆政策”（“Schaukelpolitik”），在东西方之间作出灾难性的定位取向。随着两个战后德国的和平统一，这种尴尬处境不复存在。德国首次被友好国家所环绕。从 1949 年开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是一个西方国家，即使经历了 1989-1990 年的巨变，也仍然如此。

德国的新的、稳定的西方定位对于它的欧洲邻国来说尤其是一颗定心丸，而德国-美国的特殊关系为这种定位奠定了的牢固根基。这种纽带的特殊性可以由一件小事得到充分体现：1990 年 2 月，德国外交办公室的一名接线员在为根舍外长 (H.D. Genscher) 接通与美国国务卿贝克 (James Baker) 的电话时，首先对贝克说：“上帝保佑美利坚”。德美关系从未像在 1989-1990 年间那么亲密。那是一个极其乐观的时期，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都在谈论“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期待着民主在全球范围向前迈进。

柏林发生的事件具有象征和实际的双重意义，而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抗议运动为此创造了条件。1989 年 6 月 4 日，波兰民主运动第一次在共产党国家实现了（几乎自由的）选举，1989 年 5 月，匈牙利共产党改革派政府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先于柏林墙倒塌几个月。

当然，东德人民也表现英勇。东德一些新教教会成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看不到前途的抗议人士和矢志改革的公民的庇护所；东德南部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莱比锡为其非正式之都。

随着东德政府和反对派民主运动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著名的莱比锡星期一晚抗议活动成为聚焦点。1989 年 10 月 4 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40 周年庆典后，东德政府准备对民主运动进行严厉镇压。很多人担心，政府甚至可能采取“中国式”解决手段来对付下个星

期一（10月9日）的示威活动。政府的大批军队和特种警察包围了市内老城，医院腾空了走廊，准备接收大量急诊伤员。示威者们写好了遗嘱，许多人认为自己将不会生还。一种英勇献身气氛弥漫全城。然而，当7万名示威者和平地集合起来走上街头时，军队和警方指挥官不敢下令开枪。这一刻成为东德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开端。德国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而柏林墙的倒塌不过是民主革命胜利的突出标志。

20年后的今天，许多前东德人对1989-1990年的建树不再感到自豪，有些人甚至不再使用“非暴力革命”这样的字眼，而宁可使用官僚术语“转变”（Wende）。德国东部与西部之间因经济差异而出现不和谐气氛，当柏林于11月9日庆祝柏林墙倒塌周年纪念日时，莱比锡地区却在纪念非暴力革命以及意义重大的10月9日之夜。20年后，这些不同的记忆要求人们作出坦诚的评价，取得共同的理解。尽管这种相对轻微的分歧的确存在，但它与德国及其邻国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政治成就相比微不足道。柏林墙消失以及自由德国人民的统一是这些成就的最佳体现。

-----  
*曼弗雷德·施廷内斯（Manfred Stinnes）于1978年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获得博士学位，自2003年起在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院任讲师。*